

# 习近平安全观及其时代价值

孙叶青

**【内容提要】** 习近平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维度看，这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战争与和平思想、新中国外交理念的继承性创新，引领世界和平的走向，贡献并展示中国智慧；从面向未来的维度看，它以发展为总钥匙，破解了国际关系三大主流学派理论研究的困境，实现了安全观的创新，洞察解决世界安全问题的关键环节，规划并践行了中国方案；从现实的维度看，它对国家利益予以清晰明确地诠释，既表明对政治利益的追求，也不回避经济利益，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标，赋予这一新安全观以综合创新的特征，展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前所未有的、既重视一国的自身安全又致力于世界共同安全的大国崛起之路。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安全观 和平与发展

**作者简介：** 孙叶青（1965-），上海市委党校教授（上海 200232）。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其后，习近平在出访等重要场合，进一步阐明了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总体安全观的视阈下打造周边国家和地区命运共同体、促进南南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安全思考。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提出，致力于“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sup>①</sup>，形成了应对当前国际国内、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涵盖安全理念、安全主体、安全目标、安全手段等系统丰富的安全观，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安全观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外交智慧、马克思主义战争与和平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和平共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富有远见卓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在安全观中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即价值追求、手段选择、目标定位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突破。在国际政治领域树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安全理论与实践范式，表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安全观对于解决当今世界零和思维、冷战思维大行其道，安全合作机制孱弱的现实困境，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 一、以亲、诚、惠、容为安全理念，为世界和谐提供中国智慧

习近平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sup>②</sup> 这既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和世界和平大局，又符合马克思主

<sup>①</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3页。

<sup>②</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97页。

义战争与和平安全思想，从战略高度和思想内涵两方面，实现了历史性创新。

### 1. 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外交智慧

中国古代的国家安全观与西方传承发展的主流安全观在话语体系和思想内涵上存在差异，中国人认为，最大的安全威胁不在于敌方是否强大，因为攻守力量的对比变化从根本上来说，是由能否施行仁义决定的，如《过秦论》中所言“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实施仁政是国家安全并长治久安的最终决定力量，通过把仁义威望推广到天下，使天下都来亲近、尊崇，而不敢对抗，可以求得不战而胜。

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应对今天世界和平发展难题的重要作用和国家民族发展的重大价值，并已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指出：“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sup>①</sup>

针对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安全形势，面对“中国威胁”和“中国崩溃”的舆论攻击和唱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既是中华民族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思想基础，也是以新的安全理念，应对安全困境，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智慧之源。

### 2. 发展了和平共处与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

新中国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此时，冷战的铁幕已经拉开，整个世界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中国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其安全观深受苏联影响。列宁认为：“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在上述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sup>②</sup>“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sup>③</sup>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建立在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思想基础上，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和平，1953年底，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再次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公认的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促进了地区安定、世界和平。

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顺应时代发展的大势和国际安全格局的变化，开启了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换的历史进程，致力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面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国内政治风波，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指导方针，为中国实现小康社会目标，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在雅加达召开的亚非国家峰会上，首次提出了“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的主张。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纽约联合国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系统阐述了和谐世界的理念。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安全观的理论与实践，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从偏重于对安全手段层面的阐释发展到安全价值层面的凝练。和平共处既是安全理念，也是国家间交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65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78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6页。

往的原则，主要指向是方法论。和谐世界的提出具有更加明确的价值指向特征。和谐世界思想也是中国古代“天下大同”理想在全球化时代的创新发展，展现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目标和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建设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价值追求。

### 3. 发展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战争与和平的思想

19世纪80年代中期，晚年的恩格斯提出了“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sup>①</sup>，给社会主义国家在如何看待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以有益启示。恩格斯分析了制止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认为，既然一场破坏性极大的世界战争将使社会主义革命推迟许多年，那么，一个持久安定的国际环境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来说，就显得特别重要。恩格斯对当时维持和平的可能性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认为军事技术的巨大变革和飞速发展也是制约战争的重要因素，其无法预料的灾难性后果，就是我们唯一的和平保障。此外，挑起战争的国家自身存在着困难，另一些国家担心自己在战场上经过艰难战斗取得的战果有可能被某些占据有利战略地位的国家所篡夺，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遏制一场世界战争的爆发。恩格斯认为，避免战争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世界反战力量。恩格斯认为，面临战争中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人们要想认识某一事物或现象的本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出这一事物或现象运动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今天的中国作为全球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建构中国的话语体系、阐明新安全观，不可避免地要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展、在借鉴人类文明发展成果中创新。如何选择？如何借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理论基础和方向保障。中国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就必须在安全理念上有所主张，发出中国声音。亲、诚、惠、容的安全理念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 二、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安全目标，为全球和平贡献中国方案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说：“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sup>②</sup> 习近平安全观以全球安全的视野，展望人类社会持久和平的美好前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标，具有鲜明的综合创新特征。

### 1. 冷战结束前后世界新安全观的相继提出与局限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安全形势发生巨变，非传统安全观相继出现。非传统安全观认为，安全威胁的来源多样，不再集中于军事威胁；应对安全威胁的手段也在不断丰富，不再仅仅聚焦于军事力量；对安全主体、安全手段、安全目标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主要有综合安全观、共同安全观、人类安全观、合作安全观等。

1982年，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在第五十二届联合国大会上提交了以“共同安全：生存的蓝图”为题的报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实现共同安全的目标、途径和原则。他所提倡的“共同安全”，虽然认识到国际手段高于国家手段、和平手段高于武力手段，但强调实现安全的途径主要是靠军备控制和裁军等手段，仍然带有一定的传统安全观色彩。

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天涯成比邻》呼吁，必须把关注重点由过去的集中于国际安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53页。

<sup>②</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84页。

全的传统做法扩大到今天包括人民和全球的安全上来，标志着综合安全观的形成<sup>①</sup>。综合安全观摒弃了传统安全观过于重视军事安全的做法，对经济安全和人的安全的内涵予以较为详细地阐述，但对于如何实现综合安全，除了提出综合手段之外，没有明确规划具体的实现路径。

1990年9月，时任加拿大外长克拉克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提出，安全合作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包括官方和非官方、双边和多边、有约束力的正式机制和非约束性的共识与规范等。为如何实现合作安全提出了比较具体的设想。

综上所述，冷战结束前后出现的世界新安全观是在国际安全形势发生巨变的时代背景下，对国际安全问题的新思考和主张。其共同特征是，安全的主体不仅是国家，还包括非国家、次国家集团等行体；安全威胁不仅来自军事，还包括环境、信息安全、恐怖威胁等方面；安全手段依靠多种手段的结合。其理论基础很难界定明确的归属学派，是多种安全理论的综合体现。这些先后出现的新安全观，就安全目标、安全主体、安全手段分别表达了不同的主张，但在内容的系统化、理论的深入诠释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 2. 习近平安全观实现了对以往新安全观的综合创新

2014年5月，习近平在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其内涵不是上述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的简单相加，而是吸取其有益思想的综合创新，内容全面丰富。

(1) 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安全应该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安全应该是平等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安全应该是包容的，应该把不同地区文明的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sup>②</sup>。习近平安全观对共同安全的认识不仅局限于对安全主体范围的扩展，而是更深入地阐释了共同安全的精神内涵，致力于追求普遍、平等、包容的安全。

(2) 综合安全“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面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在进一步拓展”的严峻安全形势，“通盘考虑亚洲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协调推进地区安全治理”<sup>③</sup>。习近平安全观对综合安全的诠释，不仅包含安全指涉对象的扩大，还指明了实现综合安全的对策思考和现实道路。

(3) 合作安全“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其不仅强调不同领域的合作，多种途径的安全合作，而且指出“要着眼各国共同安全利益，从低敏感领域入手，积极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sup>④</sup>。习近平安全观针对合作安全难以开展的困境，提出了从共同利益出发，由易到难，求同存异，切实推进合作安全。

(4) 可持续安全“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sup>⑤</sup>。习近平安全观不仅关注于当下，而且致力于可持续性，把维护现实安全与追求长久安全紧密结合，具有历史眼光和全局视野。

## 3. 习近平安全观实现了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综合考量

当今世界，西方话语体系中“国强必霸”的思维惯性、零和博弈的冷战模式，仍然大行其道，

① 参见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8-159页。

②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4年5月17日。

③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4年5月17日。

④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4年5月17日。

⑤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4年5月17日。

主导国际安全领域的主要思想流派，对如何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虽然提出了不同的应对之策，但其基本逻辑是一致的，就是新兴大国要求与其强大实力相称的利益和霸权，势必构成打破力量均衡和制度束缚的稳定态势，成为影响世界和平的不稳定因素。汉斯·摩根索说，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sup>①</sup>。我们如何回应对我们的攻击或担心，如何塑造一个“和平的狮子”的形象，归根结底是要讲清楚中国是如何认识国家利益、如何追求国家利益的。

习近平安全观从理论和实践上完成了对国家利益认知的嬗变。传统的中国，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待周边弱小的邻国，大多采用慷慨馈赠、薄来厚往的外交方式，对外交流更关注面子与尊严，而不是物质利益的考量。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军在战场上屡战屡败，直至八国联军入侵，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完全沦为外国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慈禧太后所说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代表了清政府在对外彻底失去自信以后，对列强的仰视心理，以及以物力奉献的手段换取统治权力的无奈选择。历史上中国对国家利益的选择，无论是处于居高临下，还是卑微仰视，经济利益从来都不是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结束了百年屈辱的近代历史，获得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在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立，国家利益聚焦于政治利益，致力于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来赢得世界和平以及地区安定、国家安全。与苏联关系恶化后，中国一度把自己看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堡垒，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无偿援助，在国家利益的考量中，重视政治利益，忽略经济利益。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规划中国发展蓝图，顺应国际局势变化和时代发展大势，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邓小平认为，中国既是大国也是小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应该致力于和平发展，不当头，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邓小平曾说，等我们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的时候，我们就多花一点力量来援助第三世界的穷国。现在我们力量不行，要缓一口气<sup>②</sup>。把中国的国家力量与对外交往中的经济利益考量结合起来，予以正视并回答。

当今的中国，经历近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国家角色认知也发生了变化。2006年，中国向世界声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sup>③</sup>。致力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新世界”<sup>④</sup>。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sup>⑤</sup> 国家安全政策和安全战略是国家安全观对外实践的表现。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合作交流的焦点问题是如何认识自己国家的利益所在，以及对外以何种手段实现其国家利益。习近平安全观展现给世界的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追求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安全的综合平衡。安全的目标不再局限于本国安全，而是涵盖了世界安全的视阈，致力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国

① 转引自葛勇平：《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1页。

② 转引自石林：《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70页。

③ 张伟超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道路篇》，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第286页。

④ 张伟超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道路篇》，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第291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00-201页。

家利益认知的理论和实践，构成了影响全球安全思想以及现实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 三、以发展作为实现安全的途径，为人类和平昭示中国道路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sup>①</sup> 习近平安全观超越传统国家安全理论主流学派的路径设计，多次强调以共同发展来实现可持续的安全，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政治领域实现了安全观前所未有的创新。

#### 1. 冷战后传统国家安全理论面对严峻的挑战

习近平安全观以共同发展为实现安全的总钥匙，实现了对传统国家安全理论的超越。传统国家安全理论大致可分为三大学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学派关于实现安全的手段有各自的主张，以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安全观认为，需要达成国家间的力量均势；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安全观认为，安全主体不仅是国家，还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建立国际安全制度是实现安全的主要路径；以建构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安全观则认为，必须通过伙伴关系的建立和观念建构实现安全。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安全形势日益错综复杂，三大学派理论的缺陷日益凸显，特别是在回答如何实现国家和地区安全、世界和平的问题上，始终未能在理论上给予回答。

#### 2. 习近平安全观实现了安全理论的创新突破

习近平安全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来思考全球安全问题、谋划实现世界安全的总体战略。“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sup>②</sup> 提出以人民为安全的主体，安全为了人民，安全依靠人民，其视野所及不仅是中国人民，还包括亚洲人民、世界人民。以人民为实现国家安全、地区和平、世界和谐的根本宗旨和出发点，展示了社会主义中国对安全问题崭新的全球视野，习近平安全观以发展作为破解安全困境的总钥匙，致力于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重大理论成果。习近平安全观聚焦于以发展为解决安全问题的“总钥匙”，超越了国家安全三大主流学派所规划的通过力量均衡、制度约束、文化建构等方式实现安全的路径思考，以及不能回答现实问题的理论困境。不仅强调发展，而且回答了如何发展的问题。首先，注重惠及民生，从国内视角思考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大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力度，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从国际视角思考“要建造经得起风雨考验的亚洲安全大厦，就应该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的根基。要推动共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努力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sup>③</sup>。其次，强调要以合作共赢理念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引领发展。最后，强调在坚持多元发展合作竞争中发展。习近平安全观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智慧。

习近平安全观定位的安全目标是“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

①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4年5月17日。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01页。

③ 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14年5月17日。

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sup>①</sup>。习近平安全观超越了国家安全三大主流学派思考的视角，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和历史眼光，从全局角度思考安全问题。把国内安全与国外安全联结起来，致力于总体安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立意深邃。其思考安全的立足点与冷战思维以及从本国安全的立场出发截然不同，超越了以一国利益为中心、国强必霸的思维逻辑，为地区安全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开辟了新的空间，提升了中国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

### 3. 习近平安全观在实践上开拓了新兴大国崛起之路

习近平安全观不仅是一种理念的追求和表述，而且把对可持续安全的追求，落实到致力于实现全球长久安全的具体战略和切实的实践当中。譬如，“一带一路”倡议、丝路基金、亚投行设立的提出和推进，开辟了建设世界安全新格局的历史篇章。

“一带一路”倡议不同于马歇尔计划附加有苛刻的政治条件且推行范围仅限于经济发达的欧洲国家，把欧洲的所有亲苏联国家都排斥在外的做法。“一带一路”倡议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涵盖大批发展中国家，涉及地域空前宽广，既是中国自身发展计划，也是全方位国际合作计划。历史上先后崛起的大国，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以“一带一路”的方式提供“公共产品”，欢迎各国“搭乘便车”。它与历史上出现的老殖民主义和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完全不同，既不是为了称霸世界，也不是单纯考虑本国利益、以邻为壑，而是要打造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可以说，以发展为实现安全的总钥匙，不仅认识到危害世界和平的根源、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交织的现实威胁，而且透视了对威胁安全的深层次根源——冷战思维、零和思维、新霸权主义、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存在的原因，进而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实现人类安全、世界和平的根本出路是共同发展，抓住了这个总钥匙，才有可能谋求世界的持久和平。

习近平安全观立足中国，放眼全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和发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安全观，不仅从理论上破解了关于西方国家安全理论三大学派不能回答的理论难题，而且在实践上开启了实现国家安定、亚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现实道路，昭示了人类可持续安全的必然选择和光明前景。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单行本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 [2] 宋德星、李庆功：《世界主要国家安全政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
- [3] [美] 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
- [4] 张蕴岭主编：《新安全观与新安全体系构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 [5]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

(编辑：张 桥)

<sup>①</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01页。